

张汉良 著

文学的边界

——语言符号的考察

Boundaries of Literature:
Explorations in the Linguistic Sign

张汉良 著

文学的边界

——语言符号的考察

Boundaries of Literature:
Explorations in the Linguistic Sig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边界——语言符号的考察/张汉良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0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09229-5

I. 文… II. 张… III. 符号学-关系-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I 206②I 106③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8401 号

文学的边界——语言符号的考察

张汉良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301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229-5/I·719

定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述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致谢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需要感谢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和宋炳辉教授的邀请。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是三十多年的好友,1982年我们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会议上初识,往还从未间断。2000年我承她宠邀赴北大出席“多元之美”学术研讨会,会后莫立了我回归故土服务的决心。本书多篇论文由她催生,发表在她创办的《跨文化对话》杂志上。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经杨乃乔教授引荐,排除万难引进我到中文系任教,对我礼遇再三,使我继续专心学术研究,铭感至深。复旦大学李楠教授除了细致地照顾我和家人的生活起居外,并引介我结识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董事长,感激之至。贺先生、孙晶副总编和责任编辑余璐瑶女士为出版学术著作所付出的心血令人感佩。本书校对承学棣台湾交通大学徐金云博士、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韩蕾和唐珂协助,特表谢意。另外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与出版先后承台湾“行政院国科会”专书写作计划《实践符号学》(NSC97-2420-H-030-004-MY2)和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项目《双城记——上海和台北的城市文本实践》(批准号 2011RWXKZD031)资助,谨此致谢。

序：在文学边界的游走

一、彷徨的比较文学学者

长久以来,比较文学家喜用“十字路口”的意象,描述他的专业面临十字路口,他徘徊、踟蹰,思索何去何从。在一个封闭的方圆之内——在“边界”之内,生活是安逸的,生命似乎是牢靠的;然而,一旦“出其东郭外”,“道路”岂仅“阻且长”?除丘坟点缀,四顾野茫茫。虽然如此,学术的探索与诠释学惯用的古典隐喻颇有启示:吾人由安身立命的、熟悉的环境:“家园”,德语所谓的“家园的”(heimlich)局限,往外探险,面临的是陌生的(unheimlich [非家园的]),甚至危险的世界,犹有更不幸者,则如但丁笔下再度离家出走的尤里西斯(奥德赛斯),终至舟覆人亡。但这则传奇岂非道尽了知识探索的真相?

1998年后半期,我独居在雅典城南,除了整日面对卫城和腓利帕普山,相看惘然外,便是在起伏的街道(希腊语称 οδος [odos])所建构的迷宫中穿梭。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而其时大学为罢课的学生“占据”,希腊语称之为 καταληψη,其来有自,仿佛见证了斯多噶学派的知识论。我当时“凝神”于早期斯多噶的符号思想,为其“占据”。然而每当由大道甲穿过 στοα[stoa](斯多噶=过道)行至大道乙时,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亦难免寻思两千三百年前,由故乡自我流放到异国雅典的芝诺、克利西普等人在回廊的漫步。我们确知道路可行,也确知“道路”发声为实体/odos/,然而不敢确定道路的概念具有任何实质性。道路之“前”?道路之“后”?古诗亦训 μετα [meta-](“之后”)为“之中”。道路错综,惟恍惟惚,其中有物、有象、有精、有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据说,苏格拉底饮鸩当天,与底比斯人科贝斯,有一段与知识有关的对话,由斐多转述,给据称不在现场的柏拉图,以及后世的你、我(96a-97b)。

苏格拉底自述求道经验,年轻时尝热衷自然(生命)科学未果,主要原因在于无法解释生命现象,包括成长与质量问题,如1加1等于2,或2减1等于1,究竟这和数“2”或差数“1”是如何产生的?苏格拉底说:“以前所用的研究方法无能为力,因此我自创方法(μεθοδου),不假他求。”这是今天英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的“method”一词的开始。一切学科都从方法的考察出发。苏格拉底的例子,不论前人如何解读,对我个人而言,从生命科学的观点,至少有三重启发。这三重启发分属系统学的量论问题,即部分之总和是否等于全体?自创理论中的生物个体之结构与该类组织在时间发展中互动的演化关系,例如,生命的成长是否为累进的?生命的分裂会导致死亡?或产生另一生命?此外,最重要的是,探索上述两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时,与两个问题互为因果的方法论问题。

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用了 μεθοδος (method)这个内含玄虚的字。希腊字源提出的问题:道路(odos)“之外”(meta)、道路“之后”(methodos)是什么?进而推演:方法之外果真别有洞天,为真理所寄?迦达默尔显然存疑:略谓 Wahrheit(真理)非由 Methode(方法)衍生。然则,两者何由逻辑的合并连词连缀,而非以分离词切断?迦氏微辞笛卡尔科学方法论,却无视斯人于暗喻路上郁郁独行。“我暗中独行,戒慎缓步,不求速达,以免失足。”(《方法论》卷二)复曰:“然而,我循昨日之路续行,沿途见任何物事,稍有疑虑,便避而远之,仿佛其绝对谬误:吾将遵行此道,以求确然,庶几有朝一日,能确知天下物事,本无确然者也。”(《沉思录》卷二)提倡新修辞学的贝荷曼(Chaim Perelman, 1912—1984)有言:“方法见诸字源,诚然犹如道路,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提出自创理论的玛吐拉那(Humberto Maturana, 1928—)和其早逝弟子巴热拉(Francisco Varela, 1946—2001)长途逆旅,为生命探源,“让我们寻访物质演变的里程碑,以考察生物的起源”。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2000年给一本论文集所写的序言,重读、重录在此,作为告解。彼时我已越界转向研究文学与生物学的关系,与传统的“文学”之路可说是渐行渐远了。为何重读?如何重读?在20世纪80年代,“重读”这个字眼突然间变成一个口头禅,这可能反映出当时各种阅读理论,包括读者反应理论、接受美学的流行,以及广义的历史主义或与文本“再现”有关的新历史主义的抬头。和这个口头禅互为因果、彼此唱和的另一句口头

禅便是：一切文本都是文本互涉的。编选这本文集我被迫重读自己，重读某些自己如今读来汗颜的作品。“为何重读？”“如何重读？”——作者所面临的考验无疑是一个西方自传作者的自我辩护的问题（*apologia pro vita sua*）。

本书大多数论文写作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学界，它们召唤出当时演出的各种与阅读有关的后结构文学理论，而这些文学理论的熔合——主要包括诠释学、修辞学、符号学——构成个人诠释的视域和策略，透过这些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可能互动，读者或者得以一窥个人重读的动机、立场、策略和学术怀抱。这份自我告解也顺便权充了向编者的致歉词，我无法把近四十年来的不同场合所发表的论文，在体例上修正和统一。保留它们原来书写与出版的面貌也许更能让人看出作者学术的历史面向。此外，姑且不论“文学”作为“词”与“物”在历史上的复杂流变，“文学”的“存有”，借用帕米耐底斯的思路，或一个简单的推理，是靠和它对应的“非存有”所界说的，正如历史需要非历史来界说一样。虚构与真实、语言与真理这四个单元，或两组二元对立，所构成的辩证关系建构了一部学科论争史，画地为牢的文学在历史上从来就未尝出现过。我虽然祖籍山东，抗战时在贵阳出生，但在台湾地区长大，接受完整的教育。君自台湾来，应知对岸事。请容我用以下的两节介绍“比较文学在台湾的学科建设”和先后在台港地区由叶维廉启动的“共同诗学”。

二、关于台湾经验

比较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戴望舒等人译介到中国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把当时欧洲学者所关心的泛欧洲文学史问题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由于种种因素，欧陆的研究方法未能在中国的文学界植根成长、开花结果，比较文学的发展仿佛是夭折了。比较文学在中文世界中的第二次再出发应该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在台湾地区的建制化，具体的建制包括台湾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点的成立，两份刊物的创办，也就是《中外文学》和英文的《淡江评论》（*Tamkung Review*），以及比较文学学会的创立，还有从 1971 年开始每四年在淡江大学召开一次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本人因缘际会都参加了上述的活动，时过境迁，四十年后再回来检讨比较文学在海峡两岸的发展，自然会

有不同的观察与评价。

1970年台湾大学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点,基于主事者的满腔热忱,参与的学者多半是台大外文系的教师,另外邀请了几位台大中文系的同仁共襄盛举。严格说来,他们没有受过正式比较文学的训练,虽然学术研究或与中西文学有关。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外文系教授在美国攻读博士时,美国学院流行的文学教学工具仍是“新批评”,因此他们所擅长的也是新批评的实践方法,包括文本的细读,特别专注于语意层次的张力、多义性、反讽等。虽然在同时,神话原型批评和诠释批评已经对新批评发出各种挑战,但是新批评挟其分析利器,在教学上的功用始终不坠。

新批评研究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脉络不太关注。至于构成作品的其他动因,如种族、性别等因素,皆视为文学作品的外缘因素,与文学的内涵意义没有关系。就文学系统本身而论,新批评所了解的文本,推而广之,也无非是传统所认可的虚构文类,如诗、小说、戏剧等。至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都被视为文学的“外缘”研究。这种立场又以美国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韦勒克表达得最为明确。在20世纪50年代,他写了一系列带有宣战意味的论文,批判传统法国比较文学研究,强调回归文本和“文学性”,因此比较文学研究和新批评学派的方法论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统领了将近二十年的风骚。反讽的是,韦勒克出身于布拉格查理斯大学,于20世纪40年代移民美国,在大学任教,最后在耶鲁大学担任尊崇的斯特林讲座。他所推动的文学自主论和布拉格学派有相当的出入。我于1996年在布拉格查理斯大学客座,讲授古典符号学,并参与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活动,曾经翻阅过布拉格学派的刊物,如《语言与语言艺术》,发现当时的韦勒克未曾发表过任何有分量的语言学和文学理论文章,偶尔引介英国文学史的材料。布拉格学派非常注意语言和文化的系统性,并且反对任何一个系统的孤立性,有名的功能主义指的其实是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哥本哈根学派的功能主义不尽相容。由于50年代美国极右派的麦卡锡主义当道,对任何意识形态的文学文化理论都予以封杀,韦勒克来到美国之后,引介欧陆文学理论与批评时,包括布拉格学派,都已经加工或作了消音处理,因此导致学界误认布拉格学派是形式至上论。这段历史公案还需要有人重新评断。

在台大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点之前,新批评已经被台湾地区的外文系广泛使用,推波助澜的是新批评健将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和佩华伦(Robert Penn Warren, 1905—1989)两人所著的《了解诗歌》、《了解虚构》以及《文学的一种研究法》,这些书在台湾地区经过翻版,被广泛应用。当时最出名的理论著作,便是韦勒克和沃伦(Austin Warren, 1899—1986)合撰的《文学理论》,先后有两种中译本。这些教科书都传达了相同的意旨,即正确的文学研究是内涵,是以文本为依归,是和文化、历史、社会无关的。不幸的是,新批评的遗害直到今天还影响学院中的少数师生。在这种文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架构中,美国比较文学终于被介绍到台湾来了。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颜元叔教授以新批评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古典诗的一系列解读,这些文章也引起了不小的学术论战。让我们回到台大外文系的比较文学博士点。博士班成立时,开出的菜单是什么呢?我们随便问问:文学的范围有哪些?相信很多人的答案是,文学包括小说、诗和戏剧,也许再加上文学批评。因此研究所端出的菜单是四门课:1)比较小说;2)比较诗歌;3)比较戏剧;4)比较批评。这四门课就构成当年台大外文系比较文学博士班的必修课程。我想今天很多人见到这份课程,对其粗糙性和化约性都会不禁哑然失笑。这种看似周延的课程(我说它周延是因为它包括了文学的全体),也许唯一遗漏的就是“比较散文”吧。但我们不禁想问,难道文学只是这些简陋的文类区分吗?

为了配合所开出的四门课,外文系四处寻访教师。在师资缺乏的情况下,各种权宜之计、各种修正版本便应运而生。修订版包括返台客座的美籍华裔学者,任开一门课,只要与这四种文类有关者就可以满足课名的条件。开过“比较诗歌”的有四五位,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叶维廉。修订版的另一种做法是被形势所迫实在连趁休假时返台任教的学者也找不到了,就由外文系的一位老师和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合开。以我今天关注的题目文学理论为例,外文系的颜元叔教授和中文系的张健教授合开“比较批评”。颜教授所用的课本就是他翻译的《西洋文学批评史》,作者是之前提到过的布鲁克斯和温塞特(William K. Wimsatt, 1907—1975),颜先生自嘲这本书代表新批评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念。新批评的立场使得他们对某些历史人物抱持相当批判的态度,他特别举出英国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82—1888)在这本书中遭受到严厉的批判。颜教授说,因他很推崇阿诺德的文学批评人生观念,因此在翻译阿诺德这章的时候,动了一点手脚,让读者觉得这两位作者蛮支持阿诺德的。

台湾大学比较文学教学的早年历史都在这种削足适履、因陋就简的情况下进行。由于台大外文系扮演着当代英美文学理论引介的重要角色,引介者多半先后自美学成归台,很自然地把他们所研究、尊崇、信仰的文学理论介绍进来。久而久之,外界产生一个印象,台大外文研究所是研究文学理论的。观察这几十年来博士班招生的计划大纲,可见一斑。有一阵十之八九是解构主义,过一阵大多数申请书上的题目是精神分析,再过一阵是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研究。台湾地区前几年非常流行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精神分析,多半是由翻译第二手资料得来,对拉康精神分析发展的背景、它和当年法国精神分析主流的倾轧,以及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关系都缺少深入的、历史性的了解。当代重要的学者,如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艾柯(Umberto Eco, 1932—)等人对西方古典思潮都有深刻的研究。德里达和语言哲学有关的学术并非仅从现代语言学出发,亦源出于他和柏拉图本体论与知识论的对话。他的阅读策略其实因袭中世纪手抄本的写作阅读策略,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心/边缘说、补充性阅读、书写痕迹等,无一不脱胎于中世纪抄本的生产过程。一般青年学者解构、去中心等口号,成天挂在嘴上,却不知道这个背景。

我们都知道,比较文学从开始发展的一百多年以来,都在接受各种新理论、新学说的挑战,也不断在改变自己的方向,调整脚步,因此它与新兴学术发展的结合是自然的事。然而,这里面隐含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反思。传统上比较文学处理文学关系,国与国之间、国家文学与国家文学之间、断代与断代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文类与文类之间的关系,甚至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都以文学史为出发点与依归。科班出身的比较文学学者参加博士班教师阵营的反而很少,学生也没有机会学习传统上比较文学的课题,没有机会了解这门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与发展历史。早年在新批评影响之下的课程规划很自然地走向叶维廉教授所提倡的“共同诗学”。今天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共同诗学是一种违反历史的、真空的、不存在的东西,任何一个奢言共同诗学的人都有他的历史性、他的诠释

视域。构成其历史性和诠释视域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语言、种族、身份、意识形态,所谓纯粹的共同诗学已经是被诠释过的、不纯粹的东西。共同诗学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甚至中国大陆的命运都很短暂,除了违反历史特定性外,它无法走出诗学系统和其他系统对话,也是早夭的原因之一。在这篇自序的下一节我将就这个课题稍做发挥。

三、回顾“共同诗学”

“诗学”在现代文学理论的脉络中,有相当严格的定义;它以结构语言学为理论模式,发展出表意系统和传播系统架构,不是通俗所谓的“诗论”。发扬光大的人是本书一再重复介绍的罗曼·雅可布逊。然而这种意义的“诗学”为何未能在海峡两岸开展、落地生根?原因只能以“国人反分析”,或“与我国国情不合”一语带过吗?

请容我暂时离开话题,绕一个批评史的圈子。复旦大学的杨乃乔教授前几年曾主编了一本《比较诗学》;参与创作的学者多达六十人,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刘燕教授撰写“叶维廉”这个条目。在撰写过程中,刘燕曾跟我讨论过“共同诗学”这个术语的出处。据她说,大多数内地学者都把它追溯到叶维廉,但是她翻遍了作者文集,并没有看到这个名词。刘燕指出,在《比较文学丛书》的总序文中,叶维廉用了英文的“common poetics”一词,可是中文是“共同的文学规律”,并非“共同诗学”。

刘燕的质疑其实也可以说解决了这件悬案。“共同诗学”这个名词在中西比较文学中的身份,包括它的源起,是暧昧的,是一种矛盾的悖论关系。中文没有“共同诗学”这个名词,只有“共同的文学规律”,而英文却有“common poetics”,因此我们可以直白地说,就字面上与实质上来说,根本就没有“共同诗学”。至于“common poetics”被翻译成“共同的文学规律”,是否作者语含玄机,或不愿意“共同诗学”这个名词出现,以免误导读者?既然如此,作者又为何要用英文的“common poetics”?就行文看来,作者显然假设“common poetics”在西方,或者说在使用英语的世界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或学术研究范畴。但是“common poetics”在英语学界并不是一个具有共识、约定俗成的研究领域。“common poetics”假设文学的普世性或共相,

前面再加上一个“共同”变成一个累赘的、重复的说法,因为 poetics(“诗学”)本来就意味着普遍性。

和“common poetics”相近的用法在西方确实存在,晚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人用过的另一个术语是“comparative poetics”(“比较诗学”)。197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诗与诗学百科全书》,主编者是阿列克斯·普瑞旻格,其中收有“comparative poetics”(即“比较诗学”)条目。1982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纽约大学举办第十届大会,1985年出版的论文集第二卷便命名为 *Comparative Poetics*《比较诗学》,主编者是加州大学的归岸(Claudio Guillén,内地翻译为“纪延”,由于“归岸”为叶维廉所译,经 Guillén 同意,并据以印制名片,故本文从叶译)。后来普林斯顿的教授厄尔·迈纳(Earl Miner, 1927—2004)在1990年出版了《比较诗学:有关文学理论的一篇文化间论文》这本书。最近几年国内的学者热衷此道,相关著作不少。

走笔至此,我们的工作似乎可以化约为厘清“共同诗学”与“比较诗学”这两个名词。让我们还是回到叶维廉的总序,也就是“common poetics”的出处。他的总序中有这么一段:“这些专书企图在跨文化、跨国度的文学作品及理论之间,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common poetics)、共同的美学据点(common aesthetic grounds)的可能性。”这个命题和他下面的陈述其实是相互冲突矛盾的。他接着这么说:“在这个努力中,我们不随便信赖权威,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权威,而希望从不同文化、不同美学的系统里,分辨出不同的美学据点和假定,从而找出其间的歧义和可能汇通的线路;亦即是说,绝不轻率地以甲文化的据点来定夺乙文化的据点及其所产生的观、感形式、表达程序及评价标准。”在上面这段话里有一个基本的矛盾我已经指出来了,“共同诗学”和“文化相对论”根本是南辕北辙,立场截然不同而无法汇通的。此外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也就是表述文化相对论的这一句,到底反映出什么样的观点?难道有一种观点能在各种文化、各种系统之上或之外吗?任何一个从事文化研究的人都有处身的时空范畴、文化脉络,这些因素形成了观物视域,他不可能同时具有多元、多文化观点,这种超越性的观点严格说来是神学的范畴,超越了人类知识。其实叶维廉点出了“共同诗学”的难题与这个难题的真解,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性。这套丛书出版后,包括我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为各学界广泛阅读,尤其是文

化本位主义者对后面那一半陈述更是心有戚戚焉,认为我们不应该接受西方文学理论为权威,而应该有自己的美学据点和假定。某些学者心仪、并不断炒作叶维廉的“模子”论,正是基于这种文化本位主义心态。

也许我们暂时撇开“文化相对论”,而冒险地来谈谈所谓的“共同诗学”。让我们再回到叶维廉身上。如果今天有人质问什么是“共同诗学”?什么是超越文化的“共同的文学规律”?我不相信叶维廉或任何人能讲得很清楚。20世纪70年代初叶维廉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文学系任教,这个新成立的系所创办人之一是前述的归岸教授。1971年台湾淡江大学第一次办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叶维廉邀请归岸来台,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诗语言的平行结构,我当时在场,躬逢其盛。归岸发表论文时明白地指出:他的理论来源是语言学家雅可布逊。

雅氏在20世纪初创立了莫斯科语言学派,与提尼雅诺夫推动文学的结构研究,后来他到了布拉格,创办了布拉格语言学派以及重要期刊《语言与语言艺术》。欧战使得雅可布逊流亡美国,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直到他去世。他对20世纪语言学及诗学的影响无与伦比。1958年,印第安纳大学举办了一场重要的学术会议,讨论“文体”(或“风格”)问题。雅可布逊在会议闭幕时做了总结报告,这篇演说为现代诗学定了调,题目是“结语:语言学与诗学”。这里的“结语”一语双关,一方面指涉会议分组的闭幕词,另一方面暗示盖棺论定。20世纪60年代雅可布逊积极地发扬、实践他的诗学理论,仔细分析多达十种语言的诗作品,包括主要语系的英、法、德、斯拉夫语言,还有中国诗。他通过哈佛大学的中文学者做他的中介人,帮助他阅读古代汉语。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形式主义美学的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绝对是雅可布逊。当年归岸来台湾开会,论文显示他利用雅可布逊的理论阅读多种语言的诗作,可以说已经开创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先河。叶维廉之聪慧独创,自然不在话下;但是他缺乏严格的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训练,未能深入背后的复杂理论架构;而其热衷的道家美学和现象学又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道而驰。我们只能臆测并假设他的“共同诗学”一词,是经过他与同事归岸接触,耳濡目染的产物,而反讽的是,归岸却又公然宣布其方法论借自雅可布逊。更有趣的是,叶维廉提出了一个语焉不详的名词,却赋予它一个

文化相对论的解释。因此在当代汉语文论世界里,可能发展出的“共同诗学”或“比较诗学”还没出生就已经胎死腹中了。反省至此,怎不令人扼腕?我现在归纳雅可布逊的理论,得出一个图表,刊登在本书各章内,希望读者能把它与其为人熟悉的语言传播结构相互参照,仔细探究语码与讯息的互动关系,朝向诗学之路迈进。

从叶维廉的“共同诗学”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作者任教的学术环境与生态。20世纪60年代在北美学界主导中国诗学研究的华裔学者,大致来自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大陆和50—60年代的台湾地区。他们在北美学府接受研究所教育,无形中配合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交政策下的区域研究,从事中国研究,并担任中文教职。60年代,最主要的诗学者包括西岸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1962年刘的《中国诗学》出版,书中指出由于中国语言的特色,诗人得以专注事物的本质,因此中国诗具有抽象的浓缩性,但缺乏精确性。然而瑕不掩瑜,“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诗处理的应该是共相而非殊相。”中国诗人特别擅长此道。刘若愚的说法被大多数人接受。后起的叶维廉和刘若愚的说法大致相同,认为中国诗受到古汉语特质的影响,具有特殊的再现自然方式。诗语言的自然性或约定性,是一个长久聚讼的问题,20世纪初庞德等人对中国语言的特殊诗功能的荒诞说法已是老生常谈,此地似乎不必重复,但这个话题与当年的北美中国诗论有显著的相关性。

正当叶维廉在建构他独特的诗论时,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和康奈尔大学的梅祖麟正在从事近体诗研究。他们的两篇长论分别发表在1971年和1978年的《哈佛亚洲研究》上,奠定了他们在北美的学术地位。几乎同时,在法国的程抱一也发表了他的《中国诗书写》,由前卫的门槛出版社出版(1977)。高友工和梅祖麟在1971年的论文中指出“中文(古汉语)的名词接近事物的普遍性的共相”。他们描述古汉语的名词为“没有被装饰过的原型名词”。这些话背后的理论假设是名词与自然现象之间一种直接的象似性关系。高、梅二氏说这些话时,正当结构语言学和诗学的鼎盛时期——后者曾被归岸于1971年引入台湾的比较诗学的研究,但是并未发生任何的影响。

虽然如此,词汇和语法的象似性被高友工和梅祖麟二氏不自觉地介绍到台湾学界时,受到本土学者热烈的欢迎,因为这和传统诗话所反映的质朴的、唯心式的模拟论调,如“性灵格调”、“情景交融”、“境界”等十分契合。反

讽的是,20世纪60—70年代基于索绪尔语言学模式发展出来的结构诗学从来就未落地生根。也许是由于传统学者对于语言分析和语言学发展出来的诗学,抱着怀疑的态度。高友工和梅祖麟两人算是例外。但是他们的应用有许多偏差,基本上是由于素朴象似论的作祟,以及对雅可布逊理论的过度简化与误用。

下面举几个被上述学者所讨论过的例子:

- (1)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 (2)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 (3) 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
- (4)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 (5)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刘若愚(1962)举出例(1)王维的两行诗中的“山”、“鸟”和“涧”,属于单数或复数无关紧要。古汉语的缺乏词尾的变化配合主词的省略,有助于诗产生的无时间性与普遍共相。叶维廉(1969)认为例(2)和例(3)让我们“直接看到自然事物”,而英语翻译却让我们看到语言的分析过程,蒙蔽了事物的直接演出。他认为根据西方语言,把汉语文法化,是一种语法的强制行为,反映出分析性和逻辑演绎,完全摧毁了事物的戏剧性……和事物最纯粹的形式。叶维廉的诗论反映出的素朴的象似性缺乏语言学理论的支撑。但反讽的是,他仿佛预见到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热衷于文化先验语义范畴的范式转换。高友工和梅祖麟于1978年发表了长篇巨构,讨论唐诗的隐喻结构,算是正式地应用雅可布逊的诗语言对应理论。可惜的是,他们和1971年一样,无法丢掉唯心论的包袱,坚持中国诗意象的始原性和其语言所呈现的宇宙共相,因而忽略了雅可布逊语言分析的精要。其次,它们所讨论的是近体诗,而近体诗在形式上工整的对仗,是自明的事实,分析其词语、语